

撤点并校对不同收入家庭学生 政策效应的比较评估

胡宏伟 汤爱学 江海霞 袁水苹*

【摘要】撤点并校政策的实施对贫困家庭的影响值得关注。利用西北农村地区撤点并校调研数据，采用交互、回归等分析方法，比较分析撤点并校对贫穷家庭和富裕家庭所产生的政策效应差异。结果发现，相对于富裕家庭学生，撤点并校政策对贫困家庭学生的负向影响更高，正向影响相对更低，具体表现为贫穷家庭的学生相对有更大的学习压力、成绩提高更不明显、同学关系趋向紧张，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在研究结论基础上，提出应从价值原则、政策目标、适用性、决策机制、政策补偿五个方面确立更为全面的政策考量体系，才能有助于重新认识、理解和调整现有的撤点并校政策。

【关键词】撤点并校 贫困家庭学生 政策效应 比较评估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486(2016)01-0110-21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一) 撤点并校政策的背景与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就近入学、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为特征的义务教育规划布局，并逐步形成了“乡村分散办学、办学点分布广、基层为重心”的办学格局，特别是在1986年颁发的《义务教育法》中明确了“就

* 胡宏伟，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美国罗格斯大学华民研究中心，研究员；汤爱学，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江海霞，北京大学人口所，博士研究生；袁水苹，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本科生。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CGL072）、河北省社科基金（HB15GL056）。

近入学”原则，这些都较大程度上确保了我国义务教育（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的普及和发展（杨东平、王帅，2013）。而进入21世纪，由于人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约束，我国开始在农村地区实施撤点并校政策改革。

从某种意义而言，撤点并校政策提出与推行是我国人口结构变动、要素投入调整和政策规划设计等综合因素的结果。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直接减少了我国学龄人口规模，这直接导致了相当一部地方学龄儿童规模偏小，而同时，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也致使相当一部分学龄儿童随父母进城，这些都导致一些教学点无法招收到足够开班的学生；另一方面，基层机构改革（特别是以并乡、并村、并校、减人、减事、减支为主体的乡镇机构改革）加速了区域内教学资源重新整合布局，而义务教育投入主体的改变和分税制改革，则让地方政府实质上担负了义务教育经费负担，这都直接给地方政府撤点并校提供了刺激和动力（崔多立，2012）。

回顾我国撤点并校政策演进、发展的全过程，大体上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局部探索阶段、规划实施阶段、调整完善阶段（杨东平、王帅，2013；张森，2015）。第一阶段，局部探索阶段。进入20世纪90年代，面临日益严重的农村学龄人口减少以及教育经费不足的矛盾，少数省份开始了调整教育资源布局、整合提升教育规模的探索尝试，取得了一定积极效果，这也引起了国家的重视。1992年，国家教委、国家计委、人事部、财政部发文，提出要“调整学校布局、精简人员、提高办学效益”，并将这一阶段的政策重点确定为精简人员，同时，开始提倡小学和初中的设置应当考虑“适当集中、相对集中”原则。这一时期的教育布局调整仅局限在少数省份，而国家部委的文件也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就近入学”的原则，仅仅是对教育规划做出了局部的、非刚性的方向调整。第二阶段，规划实施阶段。2001年，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要求“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与此同时，教育部、财政部也联合下发《关于保送中小学布局调整规划的通知》，我国正式进入撤点并校规划实施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各省开始了大规模的撤点并校、优化教育资源布局的工作，中心学校在师资、设施、资金等方面得到了强化，办学条件、教学水平等均有了一定程度提高；而另一方面，不少地方也出现了农村中小学撤并速度过快，出现了学生安全、成本、健康等一系列问题。总的来看，在这一阶段是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资源的大整合阶段，既是农村教育资源布局快速优化的阶段，也是撤点并校推行过快问题显现的阶段。第三阶段，调整完善阶段。随着撤点并校政策的不断推进，国家和社会各界日益意识到了撤点并校政策过快推进所

带来的不利后果,并开始了相应政策措施的反思和调整。2012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明确提出“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学校”,并要求“在完成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专项规划备案之前,暂停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撤并”,同时,一些不合理撤并的学校,以及群众反映问题较为强烈的地区,“确有必要的由当地人民政府进行规划、按程序予以恢复”(杨东平、王帅,2013)。这是撤点并校政策的一个关键结点,至此,撤点并校这一实施了十余年的公共政策进入了调整、反思和完善阶段。

撤点并校政策的萌发、确定、推进、扭曲、调整全过程,体现了我国在这一公共政策构建和实施过程中的逻辑价值冲突和互动机制局限,一方面,撤点并校公共政策改革的初衷是以“优化教育资源、提高教学质量、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为核心的(梁鹤、祁占勇,2014);但是,地方政府在推进这一公共政策过程中,具体措施和做法所暗含的价值取向则可能是减少教育投入(丁冬、郑风田,2015),也就是说,部分地方政府之所以有加速撤点并校进程的冲动,是因为其政策制定和推进所暗嵌的价值取向是“提升办学效益、降低生均成本”,而这一暗嵌的价值逻辑则是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面临资源约束和政绩冲动的理性选择(单丽卿、王春光,2015;丁冬、郑风田,2014)。扭曲的撤点并校政策也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较为广泛的负向效应,主要体现在安全问题(校车与住宿安全)、求学成本问题(交通、食宿、陪读等成本)提升、辍学率回升问题、食宿条件差问题、身心健康问题、教育资源浪费问题、村屯文化失落问题等,对学生、家庭、学校、政府和社会都产生了负向效应和价值冲突(张燕,2013;褚卫中、张玉慧,2012)。

(二) 问题提出:政策效应在不同家境学生的分布差异

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当优先考虑可能受到影响的弱势人群,并应当以弱势人群受到影响作为评价政策公正与效果的重要标准(罗尔斯,2001)。作为农村中最具代表性的弱势群体,贫困家庭学生在撤点并校过程中所受到的负面冲击可能更加明显,因而值得更多关注;政策实施对这一群体产生的负向影响,应该作为这项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的重要判断标准。然而,目前关注撤点并校对贫困家庭群体的影响的研究较少。另一方面,应当将学生学业、社会融入作为重要的结果标准,用以衡量撤点并校政策实施的后果,因为,这两个产出指标相对更能够体现撤点并校公共政策在学生身上所产生的深入、持久、客观影响。所以,贫困家庭(弱势家庭的代表)的学生在学业、社会融入方面的状况,应当被作为评估撤点并校政策实施效应的重要评价标准。

虽然,很多学者已经开始全面反思撤点并校政策产生的一些负面效果,并试图更为全面的对这一公共政策作出评估(张燕,2013;赵贞、邬志辉,2015;张丽珍,2014;蔡志良、孔令新,2014;徐国英,2012;吉芸,2010)。但是,应该看到,这些既有研究和尝试仍然存在三个突出不足,而这三个不足也是撤点并校政策评估一直被忽视的关键问题。第一,既有研究对撤点并校实施过程中弱势群体受到的影响关注不足。大多数研究往往将政策受众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忽视了这一群体的结构性差异和异质性,也忽视了同一公共政策可能产生的人群结构效应差别,特别是对贫困家庭学生所带来的影响可能会显著区别于其他人群。第二,忽视了撤点并校政策在学生的学习压力、学业状况、社会融入等方面所产生的效应。大部分既有研究简单的以交通成本、住宿成本、食宿状况、班级规模作为评价学生所受影响的标准,这存在显著的局限性,既不全面、亦不深入,而学生学习压力、学业表现、社会融入状况应当被视为评价撤点并校政策长期、深入效应的重要标准。第三,定量评估研究缺乏。梳理既有研究可以发现,绝大部分相关研究都是质性研究,通过定量评估方式来深入评价撤点并校政策效应的研究相对较少。

正是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试图以撤点并校政策对贫困家庭学生学业和社会融入方面产生的影响为标准 and 切入点,采用交互、回归等分析方法,对比、评估撤点并校政策对不同收入水平家庭所产生的政策效应差异,并重点考察该项政策对贫困家庭学生学业、社会融入所带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将提出一个有助于重新认识、考量和评估现有撤点并校政策的评价体系框架。本文的主要研究思路如下:首先,在回顾撤点并校政策背景、过程等方面的基础上,对以往学术界评估撤点并校政策效应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评价既有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其次,对数据进行基本的整理与分析,提出假设,并进行研究变量的选定。第三,分别运用交互分析、回归分析方法,比较在撤点并校后,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学生的效应的差异。最后,基于前面的分析结果归纳研究结论,并在分析政策作用路径的基础上,提出有助于重新认识、评估、调整撤点并校政策的考量体系框架,以深化对撤点并校政策效应及其干预调整逻辑的认识。

二、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学校合并效果评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美国上世纪60年代“学校合并”高潮的效果探究上,形成了一批较有影响的成果。部分学者认为美

国农村学校合并后的学区，为学生提供了更为广泛的课程和更多的学习机会，提高了教学质量。兰达斯（LynDel Randash）（Randash，2011）也认为，合并后的大规模学校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全面的课程以及更丰富的活动。然而雷斯伍德（Kenneth Leithwood）与湛茨（Doris Jantzi）（Jantzi，2009）则表示，学生就读于合并前的小规模学校，更容易获得较好的学业成绩。科顿（Kathleen Cotton）（Cotton，2010）在研究了合并前后学校在课程质量、学生出勤率、学生辍学率以及教师对教学的态度等各方面的差异后，也得出了学校合并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的结论。综合国外的研究成果，发现其主要从学业成绩方面来考察学校合并的效果，且未得出一致的结论，而关于学校合并其他方面的影响也存在争论。

国内教育领域的一部分学者认为，撤点并校十余年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如斯琴（2008）认为撤并后，学校设施得到极大改善，同时有利于学校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范先佐（2009）认为撤点并校提高了农村学校的规模效益，且有利于促进区域内教育的均衡发展。同时也有学者表示撤点并校实施中存在很多问题，这主要是出于对农村教育发展、学生身心健康以及家庭经济负担的考虑，如范铭、郝文武（2011）表示撤点并校后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的目的是并未达成，且加重了农民的教育负担。卢珂（2011）利用增值模型分析两期面板数据，评估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对教学质量的影响，得出政策当前对教育质量具有显著负效应这一结论。缪丽珺（2012）采用 MHT 量表对农村“撤点并校”和非“撤点并校”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测查，结果发现，农村“撤点并校”小学生在学习焦虑、过敏倾向方面比非“撤点并校”小学生差。

通过对以往研究成果的总结与分析，发现已有的研究多为理论分析，实证研究较少。在实证研究中，又多为现状描述，很少采用严谨的数量方法进行研究。且对撤点并校政策效应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政策的全部客体进行的，忽视了政策对不同特征的客体所产生的效应的差异性，因而其评估结果过于笼统。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和比较撤点并校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所产生的政策效应，重点探究撤点并校政策对贫困家庭所带来的影响，进一步深化对撤点并校政策及其调整干预的认识。

三、数据、假设与变量

（一）数据说明与研究假设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 2012 年西北农村学校合并现状及其影响的调查。该调查

覆盖了我国西北实施撤点并校政策的典型地区，主要包括甘肃、陕西、宁夏、青海四省的部分农村地区。调查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按照省、县区、学校的抽样顺序，最终每个省内抽取两所撤点并校过程中新设的中心小学，小学内按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抽取（年级）班级，并随机抽取学生，并在学校帮助下，同时访问了学生和家長。调查选中的每所小学规模在 2 000—4 000 人不等，调查共发放问卷 1 100 份，有效回收 1 002 份，有效回收率为 91.09%。调查问卷内容覆盖实施撤点并校地区学生及家庭的基本信息、当地撤点并校政策实施的现状、撤点并校的實施给学生及其家庭带来的影响，以及学生家長对撤点并校的看法四个方面的具体信息。

根据以上分析、已有的研究和本文的需要，本研究假设，相对于富裕家庭学生，撤点并校政策对贫困家庭学生的影响相对具有更大程度的负向效应。

（二）变量选取与描述

为了验证假设，本文选取撤并后学生学习压力的变化、学习成绩的变化、同学关系的变化作为衡量政策效果的变量，以撤点并校地区学生家庭的收入水平作为主要关注的自变量，分析撤点并校政策对贫困家庭学生的影响，并以富裕家庭作为政策影响的参照进行分析。

国内外学者通常用五分法对不同收入家庭或人群的富裕状况进行划分，进而可以有效的对不同收入阶层进行比较分析，对社会整体贫富分布状况进行评价（Brück et al.，2010；李强，1997；尹恒等，2006）。鉴于对政策效应比较分析的研究需要，本研究将不同家庭收入状况划分为五组，比较撤点并校政策对不用收入阶层家庭子女的影响效应。收入五分法以学生家長对本家庭在当地相对富裕状况的主观评价为依据，即“您认为您的家庭在当地的經濟状况如何”，答案包括非常贫穷、比较贫穷、一般、比较富裕和非常富裕五个等级。考虑到收入、资产等客观财富指标度量的不完整性，以及数据采集的难度、不同区域的物价水平等因素，简单运用收入、资产、储蓄等指标衡量贫富状况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观评价方法虽然会受到被访者的主观想法影响，但由于其对富裕状况的评价是基于更为全面的主观认知和感受，回答者会综合囊括收入、资产、消费水平、阶层感知等多方面因素，常被认为是一种相对较为可行的富裕程度的综合测量方案（Christiaensen et al.，2011）。同时，在回归分析中，本研究还控制了学生个人、家庭、学校三个层面的变量，具体包括民族、兄弟姐妹数量、年级、照料者、是否住宿、班级容量。

变量选择和描述分析见表 1。从表中可以看出，撤点并校后，有 28.04% 的

学生学习压力增大,成绩没有起色的占 26.18%,同学关系变得冷淡、矛盾增多的比例占了 17.22%。从表 1 可以看出,由于西北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不发达,贫穷家庭所占的比重为 67.40%,其中非常贫穷的家庭占到了被调查家庭的 32.92%,而非常富裕家庭的比重则仅为 12.85%,这表明,在实施撤点并校的农村地区,学生家庭的收入水平总体偏低;样本中汉族学生占了 69.63%;兄弟姐妹平均数量为 1.4 个;有 74.89% 的学生由父母照料,祖父母照料的比例为 19.30%;班级容量大部分集中在 41-60 人、21-40 人,此类容量的班级分别占了 41.12%、35.33%;住宿的学生仅占 31.80%。

表 1 变量描述分析 (N=912)

变量名	变量分布 (%)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学习压力变化	1 = 压力减小 (14.95)	2.131	0.643	1	3
	2 = 压力没变 (57.01)				
	3 = 压力增大 (28.04)				
学习成绩变化	0 = 没有提高 (26.18)	0.738	0.440	0	1
	1 = 成绩提高 (73.82)				
同学关系变化	1 = 关系变融洽 (42.43)	1.818	0.880	1	4
	2 = 关系一般 (40.35)				
	3 = 关系变冷淡 (10.20)				
	4 = 矛盾变多 (7.02)				
家庭收入水平	1 = 非常贫穷 (32.92)	2.332	1.345	1	5
	2 = 比较贫穷 (34.48)				
	3 = 一般 (11.91)				
	4 = 比较富裕 (7.84)				
	5 = 非常富裕 (12.85)				
民族	1 = 汉族 (69.63)	0.696	0.460	0	1
	0 = 少数民族 (30.37)				
兄弟姐妹数量	—	1.354	1.107	0	3
年级	1 = 1 年级 (10.86)	3.754	1.600	1	6
	2 = 2 年级 (11.18)				
	3 = 3 年级 (25.33)				
	4 = 4 年级 (16.01)				
	5 = 5 年级 (17.54)				
	6 = 6 年级 (19.08)				

(续上表)

变量名	变量分布 (%)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照料者	0 = 父母 (74.89)	1.309	0.575	1	3
	1 = 祖父母 (19.30)				
	2 = 其他人 (5.81)				
班级容量	1 = 20 人及以下 (10.53)	2.563	0.845	1	4
	2 = 21 - 40 人 (35.33)				
	3 = 41 - 60 人 (41.12)				
	4 = 60 人及以上 (12.83)				
是否住宿	0 = 否 (68.20)	0.318	0.466	0	1
	1 = 是 (31.80)				

资料来源：2012 年西北农村学校合并现状及其影响的调查。

四、政策效应比较分析

下文将进一步比较撤点并校政策对不同家庭经济状况孩子的影响效应，首先通过交互分析，比较在撤点并校后，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学生在学习压力、学习成绩、与同学关系三个方面变动状况的差异，之后，将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深化交互分析结论的认识、检验交互分析结论的稳健性。

(一) 政策效应比较分析：基于收入五分法的比较

表 2 五分法下家庭经济状况与各因素的交互分析 (N=912)

变量名称	变量取值	家庭经济水平 (%)					检验
		贫穷	比较贫穷	一般	比较富裕	非常富裕	
学习压力变化 (%)	压力减小	11.43	8.18	13.16	12.00	43.90	$\chi^2 = 106.119$ P = 0.000
	压力没变	61.90	57.27	55.26	68.00	39.02	
	压力增大	26.67	34.55	31.58	20.00	17.07	
学习成绩变化 (%)	没有提高	29.13	23.64	43.24	28.00	10.00	$\chi^2 = 35.438$ P = 0.000
	成绩提高	70.87	76.36	56.76	72.00	90.00	
同学关系变化 (%)	关系变融洽	34.69	41.64	34.51	38.03	74.36	$\chi^2 = 78.222$ P = 0.000
	关系一般	47.96	37.85	42.48	40.85	25.64	
	关系变冷淡	8.16	14.51	12.39	12.68	0.00	
	矛盾变多	9.18	5.99	10.62	8.45	0.00	

资料来源：2012 年西北农村学校合并现状及其影响的调查。

表2将撤点并校地区的学生家庭分为非常贫穷、比较贫穷、一般、比较富裕以及非常富裕五个群体,与学生学习压力变化、学习成绩变化、同学关系变化三个变量分别进行交互分析。

1. 学习压力变化

由五分法分析得出,从总体上看,学习压力增大的比例远高于学习压力减小的比例,且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中的学生,在撤点并校后所感受到的学习压力的变化存在差异。家庭贫穷的学生在撤点并校后,表现出学习方面的压力减小和增大的比例分别为11.43%和26.67%,而家庭富裕的学生的学习压力减小和增大的比例,分别为43.90%和17.07%。此数据表明,撤点并校对贫穷家庭的影响较为显著,撤点并校后贫穷家庭的学生所感受到的压力大于富裕家庭的学生。

2. 学习成绩变化

撤点并校对学习成绩的提高作用是显著的,超过一半的学生在撤点并校后成绩得到了提高。其成绩提高的比例,随着家庭经济水平的提高依次增加。其中富裕家庭成绩提高的比例最高,比贫穷家庭高19.13%。此数据表明,撤点并校对富裕家庭学生成绩提高的影响,较贫穷家庭学生成绩提高的影响更为显著。

3. 同学关系变化

贫穷家庭的学生在撤点并校后,与同学关系变好和变差的比例分别为34.69%和9.18%,而有74.36%的非常富裕家庭的学生与同学关系变得融洽了。此数据表明,撤点并校后,富裕家庭的学生的同学关系较贫穷家庭的学生更为融洽,而贫困家庭学生的同学关系相对变差了。

上述交互分析结论初步证明了研究假设,即在撤点并校政策实施后,相对于富裕家庭学生,撤点并校政策对贫困家庭学生的影响相对具有更大程度的负向效应。同时,本研究进一步将家庭收入这一序列变量分为三组(将比较贫困、一般、比较富裕三类家庭合并作为中等收入家庭),利用三分家庭收入状况与学生学习压力变化、学习成绩变化、同学关系变化进行交互分析,所得结果与家庭收入五分组交互分析结果一致,此处不再赘述。本研究下文将利用回归分析,进一步检验上述发现的稳健性。

(二) 政策效应比较分析:基于回归方法的检验

进一步利用回归方法检验在撤点并校对不同家庭收入状况学生的影响。分别以学习压力变化、学习成绩变化、同学关系变化三个变量为因变量,以个人、

家庭、学校层面变量为自变量,具体包括民族、兄弟姐妹数量、年级、照料者、是否住宿、班级容量,利用有序 Probit 模型和二元 Logit 模型,检验不同家庭收入状况的学生在撤点并校后的表现。

回归结果与上文交互分析的结论具有一致性。回归结果显示,在撤点并校后,与富裕家庭的学生相比,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学生更可能学习压力增大、学习成绩下降、同学关系恶化,回归结果显著,这进一步深化了上文交互分析结论的稳健性。回归结果再次表明,撤点并校对不同家庭收入状况的学生的影响效应是存在差别的,与富裕家庭学生相比,贫困家庭的学生在学习压力、学习成绩和同学关系三个方面均会显著“恶化”。从相对角度来看,贫困家庭学生是撤点并校政策的“受害者”,而相对而言,农村富裕家庭的则可能是这项公共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受益者”。回归分析进一步证明了本研究假设的正确性。

另外,民族、兄弟姐妹数量、年级、照料者、是否住宿、班级容量几个变量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的状况。其中,班级容量越大有增大学习压力的可能;小学生离家住宿也存在增大学习压力的可能性;而相对于父母照料,祖母父母照料更可能导致并校后学生的同学关系恶化;与少数民族学生相比,汉族学生的学习压力变大的可能性更高。

表 3 回归分析结果

	收入五分组回归结果			收入三分组回归结果 (稳健性检验)		
	学习压力 变化	学习成绩 变化	同学关系 变化	学习压力 变化	学习成绩 变化	同学关系 变化
家庭收入水平 (参照类为非常富裕)						
贫困	0.953 *** (0.147)	-1.398 *** (0.368)	0.852 *** (0.156)			
比较贫穷	1.206 *** (0.138)	-1.074 ** (0.352)	0.902 *** (0.148)			
一般	1.089 *** (0.166)	-1.987 *** (0.385)	1.121 *** (0.173)			
比较富裕	0.754 *** (0.178)	-1.215 ** (0.421)	0.987 *** (0.185)			
家庭收入水平 (参照类为非常富裕)						
贫困				0.936 *** (0.147)	-1.361 *** (0.367)	0.846 *** (0.156)

◆ 论文

(续上表)

	收入五分组回归结果			收入三分组回归结果 (稳健性检验)		
	学习压力 变化	学习成绩 变化	同学关系 变化	学习压力 变化	学习成绩 变化	同学关系 变化
一般				1.099 *** (0.132)	-1.287 *** (0.340)	0.957 *** (0.143)
民族	0.376 *** (0.087)	0.070 (0.178)	0.084 (0.086)	0.366 *** (0.087)	0.102 (0.176)	0.079 (0.086)
兄弟姐妹数量	0.077 * (0.036)	-0.197 ** (0.072)	0.001 (0.035)	0.076 * (0.036)	-0.194 ** (0.072)	0.002 (0.035)
照料者 (参照类为父母)						
祖父母	0.034 (0.101)	-0.150 (0.205)	0.321 *** (0.096)	0.033 (0.100)	-0.104 (0.202)	0.310 ** (0.096)
其他人	-0.175 (0.164)	-0.348 (0.312)	0.112 (0.160)	-0.160 (0.163)	-0.366 (0.310)	0.116 (0.159)
年级	-0.003 (0.024)	-0.064 (0.049)	-0.045 + (0.024)	-0.000 (0.024)	-0.066 (0.049)	-0.044 + (0.024)
住宿	0.209 * (0.089)	0.233 (0.185)	0.367 *** (0.086)	0.209 * (0.089)	0.259 (0.184)	0.363 *** (0.086)
班级容量	0.218 *** (0.052)	-0.105 (0.108)	-0.024 (0.051)	0.206 *** (0.052)	-0.057 (0.105)	-0.032 (0.051)
常数项		3.040 *** (0.553)			2.848 *** (0.543)	
cut1_ cons	0.737 ** (0.244)		0.625 * (0.246)	0.701 ** (0.242)		0.596 * (0.245)
cut2_ cons	2.477 *** (0.253)		1.847 *** (0.252)	2.429 *** (0.251)		1.816 *** (0.250)
cut3_ cons			2.409 *** (0.256)			2.376 *** (0.255)
chi2	104.776	48.867	116.867	95.766	34.128	113.592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注: N=912; 小括号内是标准误;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资料来源: 2012年西北农村学校合并现状及其影响的调查。

为了检验撤点并校政策对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学生的结构性影响,本研究进一步将家庭收入这一序列变量分为三组(将比较贫困、一般、比较富裕三类家庭合并作为中等收入家庭)作为主要变量,并以虚拟变量方式纳入模型分析,同时,控制个人、家庭、学校层面的变量。回归结果见上表。限于篇幅,控制变量回归结果不再列示,仅汇报主要自变量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在撤点并校政策过程中,相对于高收入家庭学生而言,中低收入家庭学生出现学习压力变大、学习成绩无明显提升、同学关系恶化的可能性都相对更高,高收入水平家庭的学生更可能在撤点并校政策实施过程中“受益”,而中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则更可能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成为“利益受损者”,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回归结果证明了本研究原假设的正确性。

(三) 质性分析: 撤点并校政策效应比较分析

1. 访谈分析1: 政策对贫困家庭及子女影响的效应

在调查走访调查中,我们遇到一些孩子,刚上小学,只有6、7岁就要离开父母,到中心校读书。村里没有公路、没有公交车,家里也没有像样的交通工具。孩子们只得背着沉重的书包,挑着住校时煮饭用的柴火、馒头和咸菜,在崎岖的山路上徒步走四、五个小时才能到学校,特别是对于女孩子,上学路变得更加漫长,“脚疼,但没办法”一个孩子这样说道。学生一般一个星期回家一次,家离学校太远的,十多天才能回家一次。家里勉强负担孩子的食宿费用,但孩子们仍然吃不饱,每天只吃馒头和菜汤。甘肃平凉的一个孩子说道,“很饿,没钱买”,说的时候眼泪在眼里打转。撤并后从村小转入中心小学的孩子,“跟镇里小孩合不来”,往往心里有种自卑感,学习上压力也很大。多数孩子实际上并不喜欢新学校,当被问到原因时,一个孩子说道:“村里上学,给家里省钱,现在花钱多,自己也感觉压力大”。

2. 访谈分析2: 政策对富裕家庭及子女影响的效应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经济比较宽裕的家庭普遍表现的比较赞同撤点并校,家长表示对撤点并校政策很满意:“新学校条件好,老师也负责。”多数孩子也需要住校,每次都是有家长接送,“怕孩子吃不饱,每次得给装上些面包、牛奶”,一位母亲这样说道,一些实在放心不下的父母就会让孩子偷偷带手机去学校,“方便跟家里联系”。孩子们是最高兴的,家里一般会给一些零花钱,住校期间就归孩子自己支配。“新学校饭菜也好吃,”一个孩子说道,他每顿饭一般都会买两个菜。虽然撤并后孩子的花费确实有所增加,主要是因为条件变好和物价上涨造成的,而且,比较富裕的家庭普遍认为可以负担的起,“值得的,

为了孩子好”，家长们表示。

3. 访谈分析3：撤点并校、学校软硬件变化与不同家庭适应

在调查中，部分校长和老师也对撤点并校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很多校长和老师表示，撤点并校以后，学校的办学条件变好了，可以开设音、体、美等课程，一些民办教师被清退，有大学学历的老师开始进入教学队伍，而且，数量和质量都在提升。另外，大部分校长、老师都表示，撤点并校后，学校虽然硬件条件变好了，但是，仍然没有足够能力解决所有需要住宿孩子的住宿问题，“不得不让一些住的稍微近一点的回家住”，另外，“有一些条件差一点的家庭，孩子还是选择了回家（住宿），可以省住宿费和伙食费”。调查中还发现，只有一些相对好一点的县城和镇上的学校有校车，其中，还有不少是与一些个体开客车的司机签订合同来保障校车通勤，甚至一些学校并没有校车。也有不少老师表示，对于收入较少的家庭，坐校车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更何况，“有些地方道路和地形限制，也不大适合开校车过去”。

4. 访谈比较分析

综合上述访谈分析，可以得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结论。第一，撤点并校与不同经济状况的家庭的效应差异。通过对贫困家庭和富裕家庭两类家庭的实地调查与比较分析，可以发现，而相对而言，撤点并校政策的实施给富裕家庭带来的主要是正向的影响，给贫困家庭带来的政策效应则更多的表现为负向影响，因此，应当着重解决撤点并校政策的实施给农村贫困家庭的学生所带来的上学贵、上学难的问题。第二，贫困家庭学生在学业和社会融入方面比非贫困家庭学生面临更多困难和不适应。第三，撤点并校的收益与成本分布。调研中的访谈和观察都表明，撤点并校的确集中了教育资源、改善了办学条件，这在学校软硬件变化中都有较为充分的体现，当然，政府财政、教育等部门也支付了相应的成本。但是，从一个广义的成本来看，撤点并校的成本范围显然应当将家庭和孩子在撤点并校后增加的时间、金钱、精力成本涵盖在内，而在这些“追加”的成本中，相对困难的家庭显然拥有相对较低的“支付能力”和“承受能力”，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他们也是这一政策实施的“利益受损者”。调研和访谈中提出了“广义成本”是极为重要的，下文中，本研究将以增加的时间成本、金钱成本作为中介变量，检验中介效应是否存在，并根据检验结果绘制路径结构图。

五、研究结论、可能的解释与若干思考

（一）结论、本质与机制

1. 结论：相对于富裕学生，撤点并校政策对贫困家庭学生的正向作用相对较小、负向作用相对较大

通过分析，本文得到如下结论：相对于富裕家庭的学生，撤点并校政策对贫困家庭学生所带来的正向作用相对较小，带来的负向作用相对较大；具体而言，撤点并校后，中低收入家庭学生学习压力上升幅度相对更大，学习成绩提高更不明显，与同学关系紧张的可能性相对更大，即相对于高收入家庭学生而言，中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更可能在撤点并校政策实施过程中成为“利益受损者”，而高收入家庭学生更可能在撤点并校政策实施过程中“受益”，撤点并校政策对中低收入家庭学生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负向效应，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

2. 本质与机制：撤点并校政策冲击大背景下，不同收入家庭采取差异化的应对策略，导致时间和金钱成本的变动幅度（增加的成本）产生差异，上述中介效应进而影响学生状态变动产生显著差异

本研究主题及结论所要探讨的本质是，在撤点并校政策的大背景下，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学生发生的状态变化是否会存在显著差异，即在宏观政策环境改变的大背景下，所有学生的状态都可能发生了变化（或没有变化），我们所关心的是，这些变化是否在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学生中存在差异，收入差异变量是否会显著影响学生状态变动幅度、方向等（而不是状态本身）存在差异。而本研究结论所揭示的恰恰是在撤点并校政策冲击的总体背景下，收入水平的差异将会显著影响学生在状态（学习压力、学习成绩、同学关系）变化，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学生的状态变化存在显著差异。

前文研究已经证实了收入水平差异会显著影响学生学习压力变化、学习成绩变化、同学关系变化三个方面，那么，家庭收入水平变量是如何影响学生上述三个方面的变动情况呢？下文将探索去探索这一回归结论背后的机制问题，并将通过路径分析方法检验机制猜测、测量机制路径强度。当然，需要再次强调，本研究仅关心家庭收入水平变量对学生状态变化的路径解释，故分析时，重点分析在撤点并校政策背景下，收入差异因素是通过哪些变量（渠道、机制）影响学生的状态变化的。

在撤点并校政策冲击的大背景下，收入变量可能会影响不同家庭的应对策略，最主要的是，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可能在反应策略方面采取了不同的应对

方案, 这些策略和应对方案最终通过“成本”这一中介影响学生变动状态的差异。比如, 同样受到撤点影响的两个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学生, 富裕家庭可能采取应对策略(接送、租房陪读等), 使学生花费在上路时间的增幅相对于贫困家庭学生较少; 同理, 即使撤点并校带来的成本(如交通、生活费等)增加量相同, 如增加同样的交通费、住宿费等, 贫困家庭学生教育成本负担的增加幅度(如百分比)会更高, 其承受能力会更弱, 成本增幅显著高于富裕家庭学生, 也会导致低收入家庭学生在状态变动方面可能会与富裕家庭学生产生差异。而不同收入家庭在撤点并校大背景下采取这些策略差异, 会显著影响不同收入家庭学生的状态变动, 导致不同收入家庭学生在学习压力变化、学习成绩变化、同学关系变化三个方面产生显著差别。上述可能的解释(猜测)在我们的调研和案例访谈中得到了初步证实, 而且, 调查和访谈提供的信息促使我们认为, 上学时间增长幅度、教育花费增长幅度, 是最有可能成为收入水平与学生状态变化的中介变量, 也最符合理论和常识。

基于上述可能的解释路径, 下文进一步利用路径分析方法, 以上学时间增长幅度、教育花费增长幅度为中介变量, 检验可能的路径结构与中介效应。基于初始模型设定、路径分析的步骤和要求, 充分考虑参数估计结果的显著性, 并将其作为模型调整的依据。最终分析结果见下图, 图中路径分析结果提供标准化回归系数作为路径系数。

从路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在撤点并校政策冲击的大背景下, 相对于高收入家庭学生, 低收入家庭学生上学时间增长幅度、教育花费增长幅度更可能相对较高, 而这些相对增高的“成本”, 最终导致了低收入家庭学生学习压力变大的可能性显著高于富裕家庭学生, 低收入家庭学生学习成绩变好的可能性显著低于富裕家庭学生, 同时, 也导致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同学关系改善显著差于富裕家庭学生。路径分析证实、深化了本研究提出的路径猜想: 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可能在反应策略方面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案, 最终主要是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的反应可能会存在差异, 通过成本差异(时间、金钱成本变动差异)这一中介, 最终导致学生状态变动产生显著差异。^①

^① 路径模型检验过程中, 发现“上学时间增长幅度”这一中介变量并没有显著影响“同学关系变动”变量, 故在最终路径模型中去掉了二者之间的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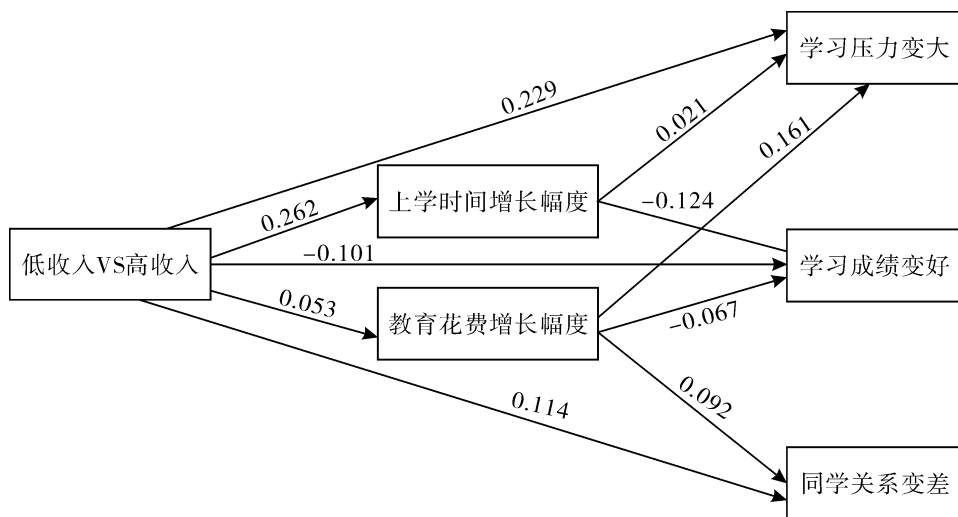


图1 撤点并校政策冲击下家庭收入对学生影响的路径分析

注：限于版面，其他控制变量影响效应略；为直观反映路径及强度，对变量名称、数值方向做了调整。

资料来源：2012年西北农村学校合并现状及其影响的调查数据。

（二）若干思考：政策与机制的再考量

近年，学术界对于撤点并校政策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这其中也不乏一些批评性的研究（单丽卿、王春光，2015；张森，2015；张丽珍，2014；蔡志良、孔令新，2014）。而本研究的贡献在于，基于微观数据和访谈观察，更为详细、客观的评估了撤点并校对于不同经济状况学生状态影响的效应差异。当然，本研究也认为，简单、粗糙的判断撤点并校政策的好坏是缺乏科学性的，应当建立和秉持更为完善的公共政策考量框架，特别是应从价值原则、政策目标、适应性、决策机制、政策补偿五个方面确立更为全面和完善的政策考量体系，才能够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理解和调整现有的撤点并校政策。应该强调，我国现有公共政策考量体系中应当理清一些基本关系问题，这既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的看待撤点并校政策实施效应，也会丰富、完善我们评价其他公共政策的视阈范围和准则体系。

1. 价值原则：基于罗尔斯差别原则的政策考量

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是指罗尔斯提出的第二正义原则的第二点内容，即公共政策应该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也就是要求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推行，应当适合于社会上最弱势群体的最大利益。在罗尔斯看来，社会上最

需要帮助的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拥有最少的权利、机会和财富，社会不平等最强烈地体现在他们身上。罗尔斯差别原则是社会政策制定与选择的重要标准，一种正义的社会制度，应该通过各种制度性安排来改善“最不利成员”的处境，缩小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差距，以更好的实现社会公平。

从罗尔斯差别原则的角度来看，撤点并校政策虽然一定程度上整合了教育资源、提高了教育质量，但是，政策本身并没有充分考虑和尊重弱势群体特别是贫困家庭的利益，以至出现了贫困家庭学生上学贵、上学难的现象。撤点并校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是基于成本收益原则，还有其他很多社会政策的制定都是基于成本收益原则，而不是罗尔斯原则，这样做的好处是使社会运行更加有效率，但同时也有可能加剧社会不公平，特别是使得弱势群体加剧沦为更加弱势的边缘群体。

因此，在撤点并校政策再调整时，应当在成本收益原则的基础上，更多的参考罗尔斯差别原则，以维护社会最底层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主要目标，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甚至给予更多政策补偿机制，在政策实施的同时，制定、发展若干补偿性或者再分配性的辅助机制，弱化政策对弱势群体的负向效应，减少或弥补弱势群体所支付的成本，使社会所有成员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这样，不仅有利于公共政策的顺利实施，而且，能够使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得到最大限度的改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进制度实施后所面临的群体公平性问题。

2. 政策目标：撤点并校政策目标排序与均衡

2001年，撤点并校政策开始推行，其本质是资源的调整与优化配置，其政策实施的重要政策目标就是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速农村城镇化”，这是在特定环境下国家教育发展的重要政策目标（梁鹤、祁占勇，2014）。而另一方面，《义务教育法》也规定“依法就近入学”，这实质上也是我国教育政策一直恪守的教育发展政策目标。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我国教育政策发展的方向应是平衡撤点并校的效率目标与保障就近入学权利的公平目标之间的均衡，但是，由于就近入学中的“就近”不易度量，以及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门强烈的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规模效应的动机，导致在部分地区的实际操作中，撤点并校的效率目标显著超越了公平目标，造成了效率目标排序在公平目标之前的现实格局。

另外，撤点并校政策推动过快、过急，带来了一系列负面效应，包括忽视了教育的公平性、削弱了农村文化建设和家庭教育、不利于儿童身心发展、增大了部分家庭教育负担等多方面，而造成撤点并校过急、过快推动的另外一个政策原因就是，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对在政策工具性和目标性的混淆。

事实上,在政策试行之处,国家对撤点并校政策的定位仅仅是优化教育资源、提升教育质量、保障教育权利的政策工具,是一项工具性政策,其本质上并不是政策目标。但是,在地方调整教育资源、实现教育资源规模效应甚至是争取上级政府资金配套投入的背景下,部分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门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混淆、颠倒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的问题(单丽卿、王春光,2015)。理顺政策目标与工具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更充分地尊重教育政策保障教育权利公平的根本目标,将权利本位置于政策工具之上,将会有益于认识、评估和调整撤点并校政策。

3. 适用性:公共政策与社会结构的嵌套性互动

公共政策的实施效果还取决于公共政策的适用性,即公共政策应当能够充分考虑既有社会结构,与现有社会结构充分互动才能最终起到良好的政策效果。同时,应该看到,公共政策与既有社会结构互动应当是嵌套性互动,而不是单一维度和无结构式差异的。以撤点并校政策为例,撤点并校政策在教育政策制定之初,并没有充分考虑(或认识不深)既有的社会财富结构可能会影响撤点并校政策实施的效果。正如本研究经验分析所发现的,同样是撤点并校政策的影响,低收入家庭学生在学习压力、学习成绩、与同学关系三个维度上就会显著差于家庭最富裕的少数群体。而由于家庭收入的差别,富人更有能力承担住宿、交通、饮食等方面的支出,而且,富裕家庭更有能力保障子女教育迁移或择校。从这个意义来看,撤点并校政策与既有社会财富结构嵌套互动的结果,致使撤点并校政策具有了某种程度或意义上的社会分层作用,当然,这种互动而产生的教育的分层,也会反过来进一步固化既有的社会结构和分层。

所以,公共政策在设定支出,就应当充分考虑公共政策实施之后与社会结构之间嵌套性互动,并应当及时回应和调整这种嵌入式互动所带来的结构性效果。基于本研究结论,撤点并校政策应当及时回应其在实行过程中对于低收入家庭学生所可能产生的负向效应,并积极通过政策补偿、社会支持等方式消减既有社会结构对撤点并校政策的非预期影响。

同时,还应大力发展乡村经济、完善乡村规划和交通建设,大力改善撤点并校政策实施的外在环境,这对于提升撤点并校政策的适应性、减少既有社会结构对政策实施的非预期干预,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4. 决策机制:多元治理框架下的政策构建与调整

正如前文所述,撤点并校政策产生的很多负面结果,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方政府在不合理激励下过激、过快推进撤点并校政策所致,而地方政府在制定

具体执行办法,以及在执行政策过程中过大的自由决策权,都表明我国在这一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治理框架存在问题,亟待改进(张铭凯、冉娟,2013)。很多学者的研究都提到过撤点并校政策没有充分尊重家长、乡民、第三方组织在撤点并校决策中的作用和地位,甚至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门单方面强行推进撤点并校时,也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程序正义”(单丽卿、王春光,2015)。应当看到,时至今日,已经不再适合推行过急、过快的撤点并校政策,而且,也应当根据十几年的政策实施效果进行政策反思和调整,而无论后续新政策拟定还是既有政策调整,都应当尊重程序正义和民主参与原则,特别是应当充分听取家长、乡民、价值中立的第三方组织的意见和建议,并让上述主体拥有平等的决策参与权。

5. 政策补偿:政策成本分担、代价补偿

任何公共政策都是有其成本和代价的,成本收益原则是公共政策制定、评估、调整的重要依据(陈振明,2004)。同时,政策成本和代价往往具有广泛性和长远性,往往超越了经济范畴,也常常可能延伸至更加长久之后。就撤点并校政策而言,家庭交通、住宿、时间等方面成本的抬升,以及农村原有三位一体教育格局被打破、农村文化衰败、社会分层固化等,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被视为撤点并校政策的成本和代价。特别是,撤点并校公共政策更大程度上增加的是相对较为贫困家庭的成本,或者,增大这些家庭承担更高风险和成本的可能,这些都需要公共政策补偿机制的建立。从这一点来看,政府应当加大对撤点并校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继续完善农村地区教育的软硬件条件,同时,增加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补助,降低成本;各级财政应进一步加大力度支持学校免费或以相对较低的价格向学生提供寄宿条件和校车接送等服务,为贫困家庭学生提供更完善、质高价低的公共服务。通过完善补偿性的辅助措施,最大程度上削减撤点并校衍生成本对贫困等脆弱家庭的冲击。

参考文献

蔡志良、孔令新(2014). 撤点并校运动背景下乡村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 114-119.

陈振明编著(2014). 公共政策学:政策分析理论、方法和技术.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褚卫中、张玉慧(2012). 农村义务教育“撤点并校”负面影响分析. 教学与管理, 7: 10-12.

崔多立(2012). 应重新评估农村“撤点并校”的实效——黑龙江省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后的调查. 教育探索, 3: 86-87.

单丽卿、王春光(2015). “撤点并校”的政策逻辑. 浙江社会科学, 3: 84-96.

- 丁冬、郑风田(2014). 地区差异、晋升锦标与撤点并校——基于1996—2009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 教育发展研究, 6: 80—84.
- 丁冬、郑风田(2015). 撤点并校: 整合教育资源还是减少教育投入? ——基于1996—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经济学(季刊), 2: 603—622.
- 范铭、郝文武(2011). 对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三个“目的”的反思——以陕西为例.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 178—187.
- 范先佐、郭清扬(2009). 我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成效、问题及对策——基于中西部6省区的调查与分析. 教育研究, 1: 31—38.
- 吉芸(2010). 让“撤点并校”少走弯路——中美农村学校合并的比较及其启示. 教育探索, 8: 146—148.
- 李强(1997). 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 社会学研究, 4: 34—43.
- 梁鹤、祁占勇(2014). 农村地区撤点并校政策的价值诉求及其现实选择. 现代教育管理, 11: 88—91.
- 卢珂(2011). 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效应评估——基于教育质量视角的增值性评估. 现代教育管理, 3: 39—42.
- 缪丽璐(2012). 农村“撤点并校”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实证研究. 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 9: 267—268.
- 斯琴(2008). 呼和浩特市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现状调查研究. 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徐国英(2012). 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政策价值分析. 教育理论与实践, 31: 21—24.
- 杨东平、王帅(2013). 从网点下伸、多种形式办学到撤点并校——徘徊于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农村义务教育政策.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5: 25—34.
- 尹恒、李实、邓曲恒(2006). 中国城镇个人收入流动性研究. 经济研究, 10: 30—43.
- 约翰·罗尔斯(2001). 正义论. 何怀宏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张丽珍(2014). “撤点并校”政策的绩效反思与优化选择.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4: 22—26.
- 张森(2015).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撤点并校”政策实施评价. 教育科学, 3: 31—35.
- 张铭凯、冉娟(2013). 从文本到人本: 农村义务教育撤点并校的价值转型. 教学与管理, 10: 7—9.
- 张燕(2013). 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之“理性纠错”. 教育评论, 2: 30—32.
- 赵贞、鄢志辉(2015). 撤点并校带来的乡村文化危机. 现代中小学教育, 1: 11—15.
- Brück, T., Danzer, A. M., Muravyev, A. & Weisshaar, N. (2010). Poverty during Transition: Household Survey Evidence from Ukrain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8 (2): 123—145.
- Christiaensen, L., Demery, L. & Kuhl, J. (2011). The (Evolving) Role of Agriculture in Poverty Reduction—An Empir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6(2): 239—254.

◆ 论文

- Cotton, K. (1996). School Size, School Climate, and Student Performance. Available at (January 21, 2016): http://api.ning.com/files/fwuYIpZ - ra70FwsglUg5mWQez - M - RAtRo4e9gM1bkBiBoDGDIDkMXA - W7x4gF1x9PIt* imiKvKogR - wjq6BhifsWKqHczpd/SchoolSizeMatters1996.pdf.
- Leithwood, K. & Jantzi, D. (2009). A Review of Empirical Evidence about School Size Effects: A Policy Perspective.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79 (1) : 464 - 490.
- Randash, L. (2011). What Are the Benefits of School Consolidation?. Available at (January 21, 2016) : http://www.ehow.com/list_6603258_benefits - school - consolidation_.html.

责任编辑：岳经纶